

文章编号: 1000 - 8934(2019)09 - 0079 - 06

“地方性场所”的实验室化过程

——以中国集体化时期的麻风防疫史为例

王程韡

(清华大学 科学史系 北京 100084)

摘要: 实验室研究在 STS 领域有着悠久的传统。但四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学术界仅在世纪之交前后大规模译介、小规模践行了实验室研究的丰硕成果。通过澄清实验室研究“对称性”打开“黑箱”的本质发现,实验室研究学者在经济金融基础设施以及医疗实践多重本体的转向不但没有跳脱出上述两条原则,而且使实验室研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结合中国集体化时期的麻风防疫史,研究还证明了将后实验室时代的研究视角应用于探究中国问题的可能性。实际上,在狭义的实验室以外探究事实和科学意义建构的广阔天地仍大有作为。

关键词: 实验室; 对称性地; 黑箱; 基础设施; 多重本体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实验室研究在 STS 领域有着悠久的传统。自 20 世纪 70 年代,人们就开始在对实验室这一“自然”场所中科学知识生产展开了全方位的探究。实验室研究的先驱拉图尔(Bruno Latour)甚至效仿阿基米德,称“给我一个实验室,我将举起全世界”⁽¹⁾。

作为一个“自我-他者-物”的现象场,实验室研究理论上可以探究与知识生产相关的所有可能的活动⁽²⁻³⁾。但 40 年过去,不但超越经典的作品凤毛麟角,甚至囿于建构主义的污名化标签,科学家会倾向于拒绝“他者”进入“自我”的物理空间。“跟随行动者”、“跟随行动中的科学”⁽⁴⁻⁵⁾,似乎变成了一个空洞的口号。如塞蒂娜(Karin Knorr-Cetina)所言,实验室研究的高潮褪去后,更多学者转向了历史(包括实验室的历史研究),或是转向了一般性的社会科学,探寻包括诊所、工厂、花园、政府机构等其他“地方性场所”的实验室化过程⁽²⁾。

那么今天,在中国,是应该放弃“近距离观察”的传统从而最低限度地满足实验室研究的先贤们为我们提供的框架和概念,还是应该因地制宜地开展真正属于我们的实验室研究,将是本文要核心回答的问题。

一、实验室研究传统和两个转向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STS 欧洲传统的兴起源于战后欧洲社会科学家对美国主导的社会科学的“正统范式”的抵制。库恩(Thomas Kuhn)所提出的科学革命的概念正好符合了那个时代的革命情绪,才会广泛地被社会接受⁽⁶⁾。

但 STS 学界对于库恩思想的发展,却是从前革命阶段所昭示的对称性开始。库恩曾历史性地指出,旧范式并不会自动消亡。相反,“直到最后抗拒者死光以后”科学家共同体才会“在一个单一的新范式内工作”⁽⁷⁾。在此基础上,SSK(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则将其明确地表述为:同样的原因应当能同时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⁸⁾。在社会建构论的基础上,拉图尔进一步延展了这种对称性,挑战了被认为是约定俗成的实验室标签本身——无论是在他对 Salk 研究所的田野工作还是对巴斯德历史表征中,实验室“内-外”的黑箱都是同时被打开的^(1,9,10)。用拉图尔的话讲,那个改变

收稿日期: 2018 - 12 - 1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L1624016)。

作者简介: 王程韡(1982—),吉林省公主岭人,哲学博士,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医学史和医学人类学、科学技术学理论与方法论等。

了法国公共卫生系统的巴斯德之所以会成功,正是因为他没把自己限制在狭义的实验空间之内^(1,10)。总之自拉图尔开始,对称地打开黑箱(即人工物或物质符号)被认为是实验室研究最为核心的方法论内涵,更预示着没有必要纠结于是或不是名义上的实验室⁽²⁻³⁾。于是第一波实验室研究高潮后,更多的实验室研究学者也开始转向其他组织形式,探究人和非人的行动者如何一起实现了力量的反转。

其中,一派沿着人工物的传统转向了经济和金融组织中定价模型、视觉系统等基础设施,讨论其物质性(materiality)和述行性(performativity)在重组社会中的意义,以拉图尔实验室研究的合作者卡龙(Michel Callon)⁽¹¹⁾、以及麦肯齐(Donald MacKenzie)⁽¹²⁾、塞蒂娜⁽¹³⁾等为代表。虽然隶属于SSK阵营的爱丁堡学派,麦肯齐却无疑是更彻底地践行了实验室研究传统的STS学者。在对Black-Scholes-Merton(BSM)模型的历史考察中发现,早期的期权定价是十分随意的,交易员也多是尔虞我诈的狠角色。模型诞生之初,实际的期权定价状况与其所预测的情况相去甚远。但后来金融市场的动荡,却极大地刺激了交易者用一种“理性”展开交易;恰好BSM模型能以一种极简的方式为交易操作提供“理性”指导……结果,原本无序的金融市场就向着模型所描述的方向收敛了,金融数学家也开始成为了交易员的主体。用麦肯齐的话来讲,模型(连同使用模型的人)实际上是创造了而不仅仅是在描述整个经济世界⁽¹²⁾。麦肯齐等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把这种对称性视角(如有序化以前的交易状况)和打开黑箱(如模型本身)的方法和时下流行的话题(模型于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实现了某种“新组合”,从而挑战了经济学对“理性”、“市场”观念的基本预设。在他们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开始注意到,原来经济学这个曾经被认为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王冠上的明珠,无非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如爱丁堡学派新一代学者普洛克甚至认为,对于很多产业分析师而言,给他们一个 2×2 的矩阵,他们就可以创造整个市场⁽¹⁴⁾。

另外一些人转向了医疗实践(中的基础设施),早期的工作同样是以历史为轴对称地打开黑箱。如藤村(John Fujimura)在《创立科学》中指出,癌症本是200多种“细胞失控增长”疾病的统称。美国癌症基因研究之所以会成为一个特定的领域,是标准化实验室中一系列标准化的理论和方法包,比如二战后才大规模兴起的组织培养技术,同医疗实

践、理论,乃至“癌症”本身共同建构的结果⁽¹⁵⁾。更革命性的转变同样出现在世纪之交:受到拉图尔的影响,莫尔(Annemarie Mol)⁽¹⁶⁾通过对荷兰某医院的民族志考察,指出并不存在一种共识性的(比如显微镜下血管造影的)动脉硬化,相反疾病本身连同相应的医疗实践都有着多重本体。注意到了不同行动者能看到不同本体,为后实验室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自此,他们就可以不再拘泥于某种时间性的主轴,不再为了不能继续讲那个从无序到有序的故事而感到苦恼。这甚至比福柯(Michel Foucault)《临床医学的诞生》⁽¹⁷⁾中所阐释的,从“你怎么不好”到“你哪里不好”更近了一步——因为外科医生所看到的动脉硬化的表征可能和病理学家看到的迥异,我们无法用一方否定另外一方⁽¹⁶⁾。以至于被权力所凝视的医疗实践的另外一端——具有病人身份和外行知识的患者也可以踏入这块领地。比如加德纳(John Gardner)⁽¹⁸⁾在对某英国儿童医院中以脑深部电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 DBS)技术治疗肌张力障碍的跨学科团队12个月的田野观察发现,对于临床实践中至关重要的运动及处理技能评测(Assessment of Motor and Process Skills, AMPS)只是一个标准“日常活动”被“自然”重现和量化打分的结果。而对于疾病/治疗的这一本体,病患虽然抵抗的机会不多,但依然可以通过“大声叹气”等方式表达自己的声音。

二、实验室研究的中国实践

坦率讲,中国并未出现过严格意义上的实验室研究,更不要说后实验室研究的两个转向,这是与中国STS发展的独特历史分不开的。

与西方世界拒绝“科学理性”的出发点不同,自然辩证法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STS流派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规模兴起却深深地被打上了科学主义的烙印。“科学的春天”以后,整个社会都充斥着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反科学、反知识、打击知识分子、打击科学家的反思。当时,定位在“在思想方法上为科学研究提供帮助”上的STS也自然得到了“官方的支持”⁽¹⁹⁻²⁰⁾。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传统,以及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传统,甚至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因为革命本身所昭示的合法性)会率先在中国流行。虽然早在90年

代就有顾昕等人注意到把“赛先生”变成“赛菩萨”的科学主义“并不有益于科学的进步”⁽²¹⁾。当时的 STS 还是被广泛地用来反对气功、特异功能等“日渐泛滥而且还大有市场,呈愈演愈烈之势,令人触目惊心”的反科学、伪科学活动⁽²²⁻²³⁾。那个时代的实验室研究,以阎康年⁽²⁴⁾的工作为代表,强调实验室的历史和组织层面的探讨,旨在“以史为镜”,为“四个现代化”提供经验借鉴。

但世纪之交前后,转机也开始显现。比如曾经“坚定的科学主义者”的刘华杰自述大约在 1998 年开始全面接触 SSK,并于 2000 年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几乎是第一篇欧洲 STS 传统的实验室研究的评述性文章⁽²⁵⁾。后来在一本从引用率这个指标上来看并不太为人所关注的著作中,刘华杰还尝试使用 STS 欧洲传统所提供的相对主义视角对“人体特异功能的兴衰史”包括自身此前作为“准运动员”、“裁判员”等身份的反思,并坦陈“自己学着站在科学之外观看科学……是一种更超然、更客观、更理性化的态度”⁽²⁶⁾。尽管刘华杰本人并未将自己的这个工作定位在实验室研究的传统之上,但在对称性的意义上还是触及了部分实验室研究的本质。可惜的是,这样的研究在那个年代也是凤毛麟角。大部分人非但没有“扎根于某个实验室中”,甚至远离“科学研究的第一现场”,玩起了书斋式的社会科学:一方面,饱受理论匮乏之苦的中国学界普遍认为当务之急是大量译介 SSK 和实验室研究的经典⁽¹⁹⁾。可惜译介也基本止步在那个年代,除了《创立科学》等少数作品被引入,大量的后实验室研究作品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受到太多关注。另一方面,拉图尔非人行动者的哲学思想以及卡龙⁽²⁷⁾饱受争议但操作性极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却被屡屡套用在解释中国案例当中,甚至连强制通行点(OPP)的图都要画得一模一样,乐此不疲——俨然 ANT 就是一个无需被打开的黑箱。真正地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以完成民族志的”⁽²⁸⁾,仅有刘珺珺团队对某岩溶试验站的考察等少数研究还比较接近——然而,短短 3 个月时间的田野,主位观点的挖掘也十分有限,也难免只能得到“既是科研人员,又是‘县上的领导干部’”⁽²⁹⁾这样干瘪而缺乏理论延展性的结论。

理论上讲,中国的人类学界本可以像他们的国际同行一样考察科学、技术、医学等特殊的文化实践活动,包括实验室,从而成为 STS 最亲密的盟友。但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人类学理论被作为“资产

阶级思想”而遭到批判,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更加强调为“促进我国的民族团结”,并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服务⁽³⁰⁾。新近兴起的医学人类学也或是关心少数民族医药的地方性实践,或是受到世界公共卫生运动大潮的影响更倾向于探讨艾滋病等“全球性”议题。经历了痛苦的转型以后,摆脱了殖民主义印记的人类学普遍以帮弱势群体发声为己任。所以在对称性地关注到不同行动者实践的层面上,并不存在太多问题。但由于非人行动者通常被排除在解释框架以外,人类学的底层进路也实际上与实验室研究的传统断绝了联系。

那么,实验室研究的传统和两个转向还能否以一种非表面化的方式与中国案例相结合?本文认为是肯定的。不过这里并没有打算另起炉灶来做一块田野。拉图尔在《我们从未现代过》中已经成熟地使用了思想实验的方法,即将实验体制诞生的有关争论看作是“人类学家的完美果蝇”⁽³¹⁾,来说明任何事先的标签和划界毫无意义。在下一部分,我们也将仿照拉图尔选一个后实验室时代的“完美果蝇”——麻风,来一探究竟。

三、集体化时期的麻风防疫: 一个拉图尔式的思想实验

如中国麻风史的历史学者梁其姿所言“麻风比任何疾病都更能定义现代与当代中国的身体政治”⁽³²⁾。按照梁其姿的解释,麻风二字分别代表了疾病的症状和致病原因。大风子油本是南亚和东南亚的物种,却经由印度传到欧洲成为了西方治疗麻风的良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通过传教士带回中国,用以证明上帝之善。新中国成立以后,带有西方色彩的大风子油疗法被贴上帝国主义(或宗教人道主义)的标签因而在 1954 年遭到弃用⁽³²⁻³³⁾。我们拉图尔式的故事便要从这里讲起,本节中所有使用到的材料都将来自于刘绍华新近出版的“人类学当代史”著作《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①(34)}。

在集体化的特殊时期,中国在应对麻风的问题上主要有两个举措:一是开始用氨苯砞(DDS)西药取代教会的大风子油疗法,二是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之下施行大规模“军事化”的强制隔离制度。特别

① 原著的一个核心论调是中国特色的科学主义教条对麻风防疫所产生的“正负交错”的影响。本部分仿照拉图尔,经验材料全部来自于刘绍华长达 15 年的田野在著作中的呈现,但本部分的遴选和解读都是作者做出的,并不代表刘绍华的观点。

针对中国万分之一以上人口感染麻风的状况,国家采取“边调查、边隔离、边治疗”方法,在全国广建麻风院与麻风村^①。建设的方法实际上非常因地制宜,除了既已存在的病院和新建房舍,空闲的房屋建筑、庙宇、旧地主庄园、军营等,都被改建为麻风病院“就地隔离”。而被收容进来的病人则在麻风院和麻风村中实行自给自足的生计模式。

如果单纯地将强制隔离理解为威权主义国家的动员和其他社会行动者的响应,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即便是在集体化时期,基层干部在动员病人入院入村也并不是大量地采用强硬手段。比如一位某四川麻风村居民就曾自述:

我没有眉毛了^②,手没出汗,就知道(生病)了。我们喝过的水别人都不敢喝,老人家说“你一定得走。”我兄弟送我来的,兄弟和我都哭得好伤心。

实际上,公社非但没有绑他去,反而“给了他一头羊和五十元”。除了羊、马、钱,公社赠与的还有小麦等口粮,以保证麻风病人在院、村里能够自给自足。除了生产和生活用具,麻风病人更带来了各种的生活技能,如养蜂、拉琴、画画、绣花、雕刻等。

相应地,麻风医生也并不必然地站在医学凝视的权力一边。在“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意识形态感召下,为避免治疗失败、产生抗药性,基层的麻风医生常常“送药到手、看服下口、吞了再走”。一些医生为了不让正在农田中工作的病人担心影响劳动,便在田头提着热水瓶等待,找机会端水给病人,要病人歇息服药,暂时帮病人挑粪、锄地,以争取病人的服药时间。在麻风院和麻风村中,麻风医生更是沾染了很多病人的习气,比如双脚蹲在板凳上吃饭,又如医生同病人在一起听曲、唱歌、抽烟等等。多数被分派至麻风领域的医生原本可能成为一般皮肤病或其他疾病的专科医生,而他们被挑选的理由常是由于家庭成分不佳等“身份政治”因素。正如某位已退休的“老麻风”(即麻风医生)所言:

麻风医生都是一群被人家瞧不起的人,去照顾一群被人家瞧不起的人。

更多的污名实际上来自于对于麻风的无知和一刀切的处理态度“病人在主流社会眼前消失,医师也不例外”。教条式的科学主义、真假莫辨的知

识、追求乌托邦理想的热忱、残酷的社会现实,以及莫名恐惧……这一系列夹杂的情绪都超过了他们在医科学校或是培训班中所学到的足以给他们赋权的東西。一位退休的女麻风医生坦陈:

那时还不太了解这疾病,我们去做追踪,都得穿隔离衣、像骑车戴的那种帽子。一整天工作下来,只有回到家后才能解手。我们的老师连路边的草都不让我们摸,就怕我们把细菌传给草了。

实际上在麻风院和麻风村中,医生的居住区域是十分狭小的,在医生和病人之间往往还保留着各种形式的隔离带——即便在一些共同的娱乐活动中,比如看电影也是如此。医生权力几乎唯一的体现便是定期的查体,病人被要求在大庭广众之下褪去衣服(女性可以保留内裤)以观察疾病的痊愈情况。而且按照他们之间的默契,医生会主动被留出上风头的位置。不过这种短暂的权力凝视,在文化大革命等更特殊的时期甚至也会被翻转:受到当时政治思潮的鼓舞,一些“老麻风”也会因成分不好或单纯的作为“精神贵族”而遭到病人的批斗,部分病人会要求走出院、村参加“串联”(但却被更高的权力机构勒令禁止)。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是由麻风这种生物性的物所联结起来的特殊的生物社会集体(biosocial collectivities)⁽³⁵⁾。

那么,麻风的本体究竟是什么?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它是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取代西方宗教人道主义,是“学苏”与同第三世界交流的一部分,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在中国的“伟大实践”。不过这些主流思想和认识却未必被其他的社会行动者全盘接受。比如麻风医生更多将其看作是顺应“身份政治”的一种时代使命,是未曾或不愿表露那么多哭泣的和原有人生轨迹的诀别,以及在那个被隔离的地方与同样被污名化的那部分群体^③结成特殊的友谊。病人也是如此:只不过他们哭,他们尝试权力翻转,甚至在国家禁止麻风病人结婚的规制下尝试在那个被隔离的地方建立起亲密关系^④。无论如何,这都超越了麻风在病理学和流行病学上的意义,是典型的莫尔⁽¹⁶⁾所言的多重本体,是在官方的学科史⁽³⁶⁾中不可见甚至被认为不重要

① 大部分麻风院、麻风村的选址就是充分利用地理位置,以山以水实现隔离。

② “掉眉”是麻风发病时常见的初期症状。因此“植眉”也是广受麻风病人欢迎的一种整形手术。

③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麻风都被认为是和瘴疠之地的南方“淫荡”女性有关。

④ 病人允许有“男女关系”,但不允许生孩子。

的东西。但疾病作为最为重要的非人行动者,却将这一群本来分属于不同世界的人,联结在一起。

四、结 论

篇幅有限,我们的思想实验只能先告一个段落。不过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得到实验室研究的传统和转向依然适用于中国实践的命题:四十年太短,短到对称地打开黑箱这个实验室研究的内核都还没来得及发生变化。四十年又太长,长到原本在狭义的实验室中开展民族志工作的 STS 学者都不约而同地转向其他田野:比如经济金融组织中的基础设施,又比如医疗实践中的多重本体。

STS 的先驱包括我们针对麻风的思想实验都以证明,实验室研究还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以时间或异质性行动者为主轴对称地打开黑箱的方式,能让我们重新思考诸多被认为是约定俗成的概念,比如权力。更为关键的是,这种立足于当下的后实验室民族志,能让我们听到被遮蔽的多元化声音,从而帮助发现和解决很多既已存在的社会问题。如 1986 年起,我国开始对麻风病采取“从隔离治疗为主转变为社会防治为主”的防治措施,新发现的病人一般在家接受治疗,原麻风村的大部分病人治愈后逐渐出院。但是仍有部分在麻风村里生活了几十年的康复病人没有户籍、没有身份证、无处可去。同样被切断生物社会集体和收回历史使命的还有“老麻风”,无法被新的医疗体系甚至旧的社会关系所接受,甚至无法在官方的记载中青史留名⁽³⁶⁾——他们只能慢慢地老去、死去,或是自娱自乐地搞搞同学会^①。刘绍华称,这也是她改变初衷决定写一本中文历史著作的核心原因⁽³⁴⁾。

总之,对称地打开黑箱就不难发现:并不是没有了麻风院、麻风村,就“基本消灭麻风”,就抹去了和麻风相关的历史和人——如他们自己所承认的,他们都是“实验品”。所以不要再纠结于科学家是否“给我一个实验室”。正如贾萨诺夫在她的共同生产(co-production)理论中所指出的,STS 应该更多地从事实建构(fact-making)转到科学的意义建构(scientific sense-making)⁽³⁷⁾,包括西斯蒙多在第

三版《STS 手册》中所强调的理论导向的“高教会派”和实证导向的“低教会派”的融合纲领(engaged program)⁽³⁸⁾,说的都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后实验室时代的实验室研究绝不应该局限于实验室本身。尤其是将“不确定性下的反复试验”⁽³⁹⁾作为核心特色在转型中国中,包括强制隔离麻风病人等一系列实验正在社会的各个层面进行着,或者进行过。别再祈求“给我……我将”——费老说,“人文世界,无处不是田野”⁽⁴⁰⁾。实验室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参考文献

- (1) Latour B. 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 the world [M]// Knorr - Cetina K D, Mulkay M J. *Science observed: 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study of science*. London;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83: 141 - 170.
- (2) Knorr - Cetina K. Laboratory Studies: The Cultur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Science [M]// Jasanoff S, Markle G E, Peterson J C, et al.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5: 140 - 166.
- (3) Knorr - Cetina K. Laboratory Studies: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M]// Smelser N, Baltes P.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Amsterdam; New York; Elsevier. 2001: 8232 - 8238.
- (4) Latour B.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5)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 - network - theory* [M].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6) Bourdieu P. *Science of science and reflexivit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 (7) Kuhn T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 (8) Bloor D.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M]. London; Boston: Routledge & K. Paul, 1976.
- (9) Latour B, Woolgar S. *Laboratory lif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M].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79.
- (10) Latour B.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11) Callon M, Muniesa F. Peripheral Vision: Economic Markets as Calculative Collective Devices [J]. *Organization Studies*, 2005, 26 (8): 1229 - 1250.
- (12) Mackenzie D A. *An engine, not a camera: how financial models shape markets* [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6.
- (13) Knorr - Cetina K, Preda A. *The sociology of financial markets* [M].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① 他们的悲惨境遇可参见刘绍华的著作。由于麻风本身的污名化,麻风医生在入院、入村前如果没结婚“找对象就难了”。即便有了家小,无法陪伴和亲子关系不好也是毋庸置疑的常态。

- (14) Pollock N, D' Adderio L. Give me a two-by-two matrix and I will create the market: Rankings, graphic visualisations and socio-materiality [J].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012, 37(8): 565-586.
- (15) Fujimura J H. *Crafting science: a sociohistory of the quest for the genetics of cancer*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6) Mol A. *The body multiple: ontology in medical practice* [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7) Foucault M.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3.
- (18) Gardner J. *Rethinking the Clinical Gaze: Patient-centred Innovation in Paediatric Neurology* [M].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7.
- (19) 范岱年. 科学社会学在中国大陆的兴起 [J]. *科学与社会*, 2015(2): 46-54.
- (20) 孙慕天. 自然辩证法六十年(上) [J]. *理论探讨*, 1988(6): 92-99.
- (21) 顾昕. 唯科学主义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90(3): 28-35+80.
- (22) 周光召. 序言: 维护科学尊严是科教兴国的重要保证 [M]//郭传杰, 李士. *维护科学尊严*.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6: 1-5.
- (23) 于光远. 论科学与伪科学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90(6): 22-27+80.
- (24) 阎康年. 英国卡文迪什实验室的传统与学风 [J]. *科研管理*, 1980(1): 70-73.
- (25) 刘华杰. 科学元勘中 SSK 学派的历史与方法论述评 [J]. *哲学研究*, 2000(1): 38-44.
- (26) 刘华杰. 中国类科学: 从哲学与社会学的观点看 [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4.
- (27) Callon M.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 [M]//Law J.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6: 196-233.
- (28) 刘珺珺. *科学社会学* [M].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9.
- (29) 徐越如. 角色与生存——一个基层科技机构的民族志调查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4(1): 58-62.
- (30) Guldin G E. *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 from Malinowski to Moscow to Mao* [M].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4.
- (31) Latour B.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32) Leung A K C. *Leprosy in China: A History*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 (33) Worboys M. The Colonial World as Mission and Mandate: Leprosy and Empire, 1900-1940 [J]. *Osiris*, 2000, 15(1): 207-218.
- (34) 劉紹華. *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 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 [M]. 新北: 衛城出版, 2018.
- (35) Rabinow P. Artificiality and enlightenment: from sociobiology to biosociality [M]//Rabinow P. *Essays on the Anthropology of Reaso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91-112.
- (36) 中国麻风防治协会. *中国麻风学学科史* [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 (37) Jasanoff S. Afterword [M]//Jasanoff S. *States of Knowledge: The Co-Production of Science the Social Orde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274-282.
- (38) Sismondo 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and an Engaged Program [M]//Hackett E J, Amsterdamska O, Lynch M, et al. *The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Third Edition)*. Cambridge, MA; London: The MIT Press, 2008: 13-30.
- (39) Heilmann S. Policy Experimentation in China's Economic Rise [J].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8, 43(1): 1-26.
- (40) 费孝通. 继往开来, 发展中国人类学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4): 2-4.

How “Locales” Become Laboratories:

Case from the History of Leprosy Prevention in Chinese Collectivization Period

WANG Cheng-wei

(Department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Laboratory studies have long history in STS.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however, Chinese STS scholars only translated the classical pieces in large scale while implemented only little empirical research. “Symmetrically” opening the “black-box” is proved to be the essential program of laboratory studies, which didn't change much, even after the infrastructure turn in finical and economical organization research, or the multi-ontology turn in medical practice studies. To the contrary, the traditional of laboratory studies are empowered with new vitalities. Possibilities on employing the perspectives from post-laboratory studies to explore China issues was also demonstrated by reinterpreting the history of leprosy prevention in the collectivization period. Turn out the co-productions of fact-making and sense-making beyond the laboratory in the narrow sense, still has plenty of chances.

Key words: laboratory; Symmetrically; black-box; infrastructure; multi-ontology

(本文责任编辑: 董春雨)